
生活方式市民化^①

——对农转非居民消费模式与闲暇模式的探讨

梁 晨

摘要: 在中国当下环境中,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这必将带来人口的市民化过程。除了包括制度身份的改变,市民化还包括适应城市一整套的生活方式。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完成制度层面市民化的人,即已经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试图讨论他们在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等生活方式方面的市民化程度。本文假设,即使完成了身份、居住地的转变,农民的市民化仍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户籍的转变并不能直接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 市民化 生活方式 农转非居民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农民主动或被动地转变为市民。农民市民化是指农民“从里到外”都变成市民,不仅转变户籍、工作、住地,而且转变心理、行为、文化。中国的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意味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更多地意味着农民的全方位转变。在此背景下,农民的市民化研究成为现今中国社会学研究中日渐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往对农民市民化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进城务工人员的市民化(王春光 2001; 刘传江、徐建玲 2008; 田珍 2009; 邱平 2010) 和通过征用土地、撤村建居的城郊农民市民化(毛丹 2009; 吴业苗 2011; 张建国 2011)。这些研究较为充分地展示了农民工和城郊失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的适应状况、适应障碍和困境(戴前宏 2009; 李路艳 2007),以及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文明教育与公民教育研究(缪青 2009)。但是,“市民化”应该立足于全社会个体,也就是说,要包括所有居民的市民化,而不是简单理解为农民的市民化。当然,就中国具体实践来看,市民化首先意味着农民全方位的转变,农民市民化是市民化的发端,但其绝不是“市民化”的最终图景;而“将农民转化为市民”是农民市民化的初始阶段,也绝不能等同于农民市民化的完整过程(陈彧 2011)。因此,对市民化的探讨需要扩展到一些已经获得市民身份的人,如通过升学、参军、家属随迁,包括土地征用、撤村建居等方式由农村进入城市生活、并且获得城市户口、在城市定居的人,探究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参与和身份认同的市民化程度。按照谢建社(2006)提出的市民化模式,即完全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应该包括以下六个含义:一是人口城镇化,二是职业非农化,三是居住城镇化,四是观念市民化,五是生活消费方式城市化,六是行动参与社区化。这部分进入城市定居、获得城市身份的人已经完成了身份城镇化、职业非农化和居住城镇化,但是在观念市民化、生活消费方式的城镇化和行动参与社区化方面是否完成、程度如何,在现今背景下是值得探索的。这个研究甚至可以扩展到全体城市居民,探究我国的城市居民是否已经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

本文集中讨论已经完成制度层面市民化的人,即已经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在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等生活方式方面的市民化程度。本文假设,即使完成了身份、居住地的转变,农民的市民化仍然是个漫长的过程,户籍的转变并不能直接带来生活方式的转变。经历“农转非”转变的城市居民没有完成在生活方式、消费方式、闲暇使用、参与程度等方面的市民化,而这些方面的市民化程度除

^① 本文脱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课程“社会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模型”的课程论文,感谢授课教师夏传玲研究员的指导。

了与制度身份转变相关,还与其现今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年龄等因素相关。同时,不仅农民或农转非居民要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的过程,在我国,全体城市居民也都在经历着这个过程,城市土著人口在生活方式方面也不是完全能够体现出其市民化一面的,其市民化程度也与他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等相关。

二、文献综述

(一) 城市化与市民化

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城市化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突出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以及“经济活动的集聚”,其实质与核心是“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变”(许成安、戴机,2002)。概括起来就是人口的转移、社会的转型和结构的转变。

市民化的概念界定显得有些复杂。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市民化概念的界定一般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进行的概念分析。从狭义角度来看,一般认为,农民市民化是指从与政府相关联的技术层面上推进农民、城市农民工等获得作为城市居民相同的合法身份和社会权利的过程,如居留权、选举权、受教育权、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等。在中国,市民化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获得所在地的城市户口。而广义的市民化还应包含市民意识的普及以及居民成为城市权利主体的过程。因此,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农民市民化则是在与国家、政府相对应的社会文化层面上,借助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使现有的传统农民在身份、地位、价值观、社会权利以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全面向城市市民的转化,以实现城市文明的社会变迁过程(陈映芳,2003;文军,2004;李辉、刘春艳,2007;吴业苗,2010)。

从广义市民化概念出发,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区分界限就在于,城市化是上至整个国家、下至一个区域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市民化则偏重于社会成员个体思维观念的转变、行为方式的变化和权利意识的发育等。当然两者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城市化是市民化的前提条件,而市民化是对城市化内涵的扩展,没有市民化就没有真正的城市化,没有社会的现代化。因此,对已经转为城市户籍的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二) 城市文化与城市生活方式:消费方式与闲暇方式

这里所谓现代城市文化是指,一种以市民性为其核心的,以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为其社会背景的,并以一套相应的法律规范和人文观念为其社会体系和价值系统的文化形态。较之传统的乡村文化,现代城市文化具有更多的理性精神、更充分的人性和更高的效率,更能适应并拓展外部环境(张伟,2004)。而城市生活方式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城市生活方式是指城市居民的全部活动方式,包括劳动生活方式、消费生活方式、闲暇生活方式和政治生活方式等。狭义的城市生活方式则专指消费、闲暇生活方式(李培志,2010)。

谭春华(2008)总结了近年来城市生活的变化:(1)城市消费结构明显升级,“衣食住行”消费位次发生变化,“食”的消费比重开始让位于“衣住行”,私房、私车进入平常居民生活,城市生活方式日趋“个性化、现代化、多元化”,人们的消费结构也由过去的“温饱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2)城市居民拥有更多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市民生活从“静态”走向“动态”,生活方式个性分层,“小资”时尚浪漫生活模式引人注目。(3)城市率先步入“数字时代”。家电和电脑网络的普及改变了生活的方方面面,电子化的生活实实在在,不再是少数人的时尚。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家政业、服务业的兴起,人们投入家务劳动的时间大大缩短,休闲时间大大提高。(4)随着“独生子女”一代逐渐步入社会的主流,整个城市社会的生活观念更新迅速,年轻人追求新的生活方式的热情和大胆,同时,随着社会各界对高学历的追求,都市“学习化社会”正在形成。(5)居住模式变迁,“商品房小区”逐渐取代了“单位宿舍”,现代社区概念逐渐形成,导引市民步入现代化新生活。这几方面的变革反映了城市生活所代表的新的消费模式、休闲模式、居住和社会参与模式,它们的出

现标志着当下中国城市生活方式已经初露端倪,“城市生活方式”的理念也已经逐渐被全民所认同;同时,消费模式、闲暇模式可以看作现代城市生活的代表,从中可以透视某群体是否已经进入现代城市生活。

谢维卫、张立云(1999)更加细致地总结了上海市居民的消费模式及其原因。他们认为,上海市居民消费有三个特征:(1)生活消费向精神性和享受性消费方向发展;(2)生活消费追求多样化、个性化;(3)消费水平趋向高质量、高品位。这三个特征基本代表了城市生活方式下消费模式的特征,形成这种消费模式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经济水平的上升,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再加上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从而导致了从“先积累、再消费”转变为“边积累、边消费”。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不同群体的消费观也存在差异,如白领的消费以“品味、魅力、高端、时髦”为准则,而蓝领阶层则更加看重“务实”等方面(陆晓文,2006),这说明城市消费方式不仅与市民化程度相关,也与经济实力、社会地位有关。在闲暇模式方面也是如此,潘允康(2002)的研究表明,当今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条件的提升为人们闲暇时间观念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人们对闲暇时间有了普遍的认识,普遍抱怨闲暇时间少,表现了对闲暇时间的需求。当然也有一些人的物质生活条件还有限,收入也还不高,因此要求“多干一天工作,多挣一天工资”。

通过对以上关于城市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和闲暇模式的文献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化中很重要的组成指标“城市生活方式”可以从用消费模式和闲暇模式这两个指标表示,对某个群体的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的探讨可以展示其市民化的状况。我们发现城市中不同群体(如白领、蓝领)的消费和闲暇模式有区别,但是背后的影响因素尚未探清。

(三) 不同群体生活方式的市民化

一些研究将研究对象转移到农民工和村转居社区的新居民等群体上。许多研究分析了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变化及其原因(严翊君,2007;纪韶、李舒丹,2010;谢培熙、朱艳,2011),以及村转居社区新居民的休闲方式的变化及原因(陈传锋、杨晶晶,2007)。这些研究结论基本揭示农民工和新居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活动虽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生活方式正逐步地被现代的生活方式所代替,已经逐步从温饱型向小康型的生活方式转变,但与市民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仍存在很大的区别,比如他们的休闲方式还是多以个体性的、家庭性的自由式娱乐活动为主,他们参加公众性的、社区性的公共娱乐活动的人数比例明显低于市民;也无法将休闲活动作为其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能很好地像市民一样出入一些社区公共娱乐场所,进行休闲娱乐,更不用说将其作为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了,也谈不上逛逛书店、看书学习、职业培训等精神消费和休闲。这些都说明农民工和村转居社区的新居民在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方面与城市居民有着一定的差距。

以上的研究或聚焦于市民,或聚焦于农民工或征地聚居的村民,对其生活方式的市民化进行研究,但缺乏对已经通过其他较为正式的途径获得城市居民身份的人在生活方式方面的研究。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正如前文提到的,城市人口中不同群体的消费模式和闲暇模式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可以将眼光聚焦到所有经历过户籍转变的农转非居民,甚至城市土著居民本身,通过分析他们的消费行为、闲暇行为来探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遵从城市生活方式。

本文将对这部分人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进行观察分析,试图探寻户口的农转非是否会带来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的变化,以及寻找生活方式市民化的影响因素。

三、生活方式市民化及其影响因素

(一) 数据与模型构建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为CGSS2003年城市问卷的调查数据,样本共5894个。其中,个人户口的农转非过程(即通过升学、参军、招工、转干、征地、家属随迁、城市扩建/移民、插队/下放/支边/平反返

城、工作调配/民转公/组织安排、购房/建房带户口、单位转制/企业迁移、投靠亲戚、购买等方式由农村户口变为城市户口) 可以看成市民化过程中的制度因素转变 ,即农民的市民身份获得; 消费方式、闲暇方式等可以看成市民化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因素。本研究假设制度因素的改变并不能完全带来社会文化因素的改变 ,即有过户口农转非经历的人在消费方式、闲暇时间使用方式等方面并未完成全面的城市化 ,即与城市居民的观念存在差异。同时 ,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个人收入等个人因素和所在地区也作为控制变量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

为了测量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 ,我们建构了两个量表 ,所用的变量及其说明见下表。每道题都是 4 级量表 ,其选项和编码分别为: 4 “很符合” 3 “较符合” 2 “不太符合” 1 “很不符合”。

表 1 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量表题器

量表名称	变量名	变量描述
消费方式	j2_2	我和我的家人过生日或遇上重要节日时 ,总是到餐馆去聚餐
	j2_3	我总是到较有名气的商店去购物
	j2_5	我出门总是坐出租车或私家小汽车
	j2_6	我家的耐用消费品大都是名牌、高档
	j2_7	我家用了好些艺术品、艺术画来装饰家庭气氛
闲暇方式	j2_10	在休息时间 ,我总是要听些音乐、或欣赏一些艺术作品
	j2_13	我经常去专门的体育场馆或健身房锻炼身体

对此量表 ,笔者采用了验证性因子模型来验证 ,分析结果如下: 整个因子模型所拟合的卡方为 278.04 ,逼近残均方根(RMSEA) 值为 0.059 除此之外 ,模型的优度拟合系数 CFI 为 0.990 ,TLI 为 0.983。这都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非常好。

由表二的结果可以看到 ,通过计算三个因子的信度系数 ,消费方式因子的信度系数均大于 0.97 ,闲暇方式因子的信度系数为 0.851 ,也是一个比较高的信度系数。

表 2 模型及题器信度系数

因子	变量	因子负荷	残方差	信度系数
消费方式	j2_2	0.737	0.008	0.985
	j2_3	0.786	0.008	0.987
	j2_5	0.747	0.009	0.984
	j2_6	0.813	0.007	0.990
	j2_7	0.733	0.009	0.984
	ρ			0.997
闲暇方式	j2_10	0.629	0.015	0.963
	j2_13	0.607	0.016	0.958
	ρ			0.980

通过计算消费方式因子和闲暇方式因子的得分并作为因变量 ,我们建立几个线性回归模型来分析农转非市民与其它户籍类型市民的差异。我们所选择的自变量如下:

户口类型: 1 指有过农转非经历的城镇居民; 2 指农村户口居民; 3 指从出生即是城镇户籍居民。经过虚拟编码后 ,有过农转非经历的城镇居民成为参照类^①。

^① 在这里之所以选择有过农转非经历的城镇居民作为参照类 ,而没有按照习惯选择城市土著居民为参照类 ,是为了方便比较其与城市土著居民和农村户口居民之间的异同。

居住地: 1 为直辖市/省会城市 2 为地级市 3 为县城 4 为城镇。

年龄: 周岁。

性别: 男性编码为 1, 此变量为虚拟变量。

教育程度: 此变量为定距变量。

政治面貌: 是否党员, 党员编码为 1, 此变量为虚拟变量。

家庭月基本生活支出: 此变量经过对数转换。

2002 年家庭收入总和: 此变量经过对数转换。

上月个人收入: 此变量经过对数转换。

在 4 个模型中, 模型 1 的自变量仅含有户籍类型一个自变量, 其目的是对比不同户籍类型的群体的消费和休闲行为; 模型 2 引入了居住地这一自变量, 试图对比城乡之间消费和休闲行为模式差异; 模型 3 在模型 2 的基础上增加了个人特征变量: 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 试图分析个人特征对不同群体的消费、休闲方式的影响; 模型 4 在模型 3 的基础上再增加经济相关变量, 如家庭月基本生活支出来表示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接下来我将逐一说明这些自变量对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的影响。

(二) 消费方式的影响因素

在消费方式方面, 由表三可知, 在模型 1 中, 有过农转非经历的群体与农村户籍群体和城市人口在消费方式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而且在模型 2 引入所在地变量之后, 不仅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消费模式方面存在差异, 而且居住地在地级市、县和镇的人群与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人群的消费模式差异非常明显, 这证明了城乡人口的消费模式的确存在差异。在模型 3 引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四个控制变量之后, 有过农转非经历的居民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消费方式的差异就变得不显著, 而且居住在地级市的人与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人群消费模式差异也变得不显著, 但居住在县和镇的人群依然与居住在城市的人群不同; 同时, 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的人在消费方式方面也显示出显著差异。我们最终选定的模型 4 引入了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这三个表示经济水平的变量, 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消费方式方面没有显著差异, 而不同类型的居住地、不同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 以及不同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的人群在消费行为方式方面则显示出显著差异。同时, 经过计算我们还可以对比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之间的消费行为差异: 在模型 1 中, 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之间的消费方式差异是显著的, 但在引入了其他变量之后城乡人口之间的消费方式差异变得不显著, 而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 以及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这几个变量中则始终显示出显著性。

通过以上 4 个模型可以看出, 首先, 在消费方式方面, 农转非居民与城市户籍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引入其他变量之后, 这种显著差异逐渐消失; 而且, 在对比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间的消费方式之后我们可以看出, 在引入其他变量之后, 城乡之间消费方式的差异从显著变为不显著, 起作用的是年龄、学历、政治面貌、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和消费支出等其他反映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量, 户籍变量也许只是中介变量, 其他变量才是影响消费方式的主要因素。其次, 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镇的人群的消费模式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引入表示个人特征、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量之后, 前两者之间的差异消失, 而县城和镇的人群与前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异, 这表明城乡之间(县和镇与大城市相比可以看作“乡”)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 但不是以户籍为表现形式。第三, 经过模型 4 我们可以明确看出, 真正影响消费方式的是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性别、年龄和居住地, 而除居住地外, 这几方面都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集中体现, 而在当下环境中, 定居的地点可以看作个人和家庭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反映, 因此, 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是消费方式的影响因素。

表 3 消费方式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户口类型 2	-.0881962*	-.0737962*	-.0203758	.0207655
户口类型 3	.0856617*	.0433862*	.0084845	.0023377
居住地: 市		-.078077*	-.0371693	.0199773
居住地: 县		-.229109*	-.1897253*	-.0478695*
居住地: 镇		-.2377342*	-.1863739*	-.0541941*
年龄			-.006283*	-.0078144*
性别			-.0338535*	-.0380177*
教育程度			.1181431*	.0709267*
年龄			.1181431*	.0709267*
政治面貌			.1476639*	.0826065*
家庭月基本生活支出				.1921749*
2002 年家庭收入总和				.0724106*
上月个人收入				.0228892*
F 值	21.18	38.06	131.92	144.90
自由度	2	5	9	12
R ²	0.0072	0.0315	0.1718	0.2723

(三) 闲暇方式的影响因素

同样,我们把目光集中到表四:在模型 1 中,有过农转非经历的人与农村户籍人口和城市居民在闲暇方式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在模型 2 引入所在地变量之后,不仅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闲暇模式方面存在差异,居住地在地级市、县和镇的人群与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人群的闲暇模式也存在显著差异,这证明了城乡人口的闲暇模式的确存在差异。在模型 3 引入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四个控制变量之后,有过农转非经历的人与农业户籍和城市户籍人口在闲暇方式方面的差异就变得不显著了,但不同居住地之间的差异依然显著;同时,不同年龄、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的人在闲暇方式方面则显示出显著差异。我们最终选定的模型 4 在此基础上引入了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三个变量,这三个变量都显示出了显著性,其他变量的显著情况与模型 2 基本相同,只是居住地在地级市的人群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人群的闲暇模式差异失去显著性。同时,经过计算我们还可以对比城市户籍人口与农村户籍人口之间的闲暇行为方式差异,这个差异与消费方式的差异是类似的:在模型 1 中,城乡不同户籍人口之间的闲暇方式差异是显著的,但在引入了其他变量之后,这个差异变为不显著,而年龄、受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以及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和个人收入这几个变量中则始终显示出显著性。

通过以上 4 个模型我们同样可以看出,首先,农转非的居民的闲暇方式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引入其他变量之后,这种显著差异消失了,不同户籍的人口在闲暇方式差异不大,甚至城乡之间的差异也不显著。由此可见,户籍变量也许只是中间变量,其他变量才是影响闲暇方式的主要因素。其次,从对不同居住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地级市、县城和镇这几类不同人群的闲暇模式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引入表示个人特征、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量之后,前两者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而县城和镇的人群与前两者之间依然存在差异,这表明城乡之间(县和镇与大城市相比可以看作“乡”)的差异是确实存在的,但这种差异并没有以户籍为表现形式。第三,最终模型 4 让我们认识到,真正影响消费方式的是家庭消费支出、家庭收入、个人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政治面貌和居住地这几个变量,同上文对影响消费模式的因素分析一样,居住地依然可以看作这几类个人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体现,而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是闲暇方式影响因素。

表 4 闲暇方式回归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户口类型 2	-.0974119*	-.0865287*	-.0438543	-.0170434
户口类型 3	.0668804*	.0327488*	.0024693	-.0027523
居住地: 市		-.0820708*	-.0499155*	-.0068073
居住地: 县		-.1802189*	-.149035*	-.041006*
居住地: 镇		-.1861931*	-.1461702*	-.047279*
年龄			-.0054261*	-.0064211*
性别			-.0142919	-.0160194
教育程度			.0961823*	.0594464*
年龄			.0961823*	.0594464*
政治面貌			.1188979*	.0729052*
家庭月基本生活支出				.1423229*
2002 年家庭收入总和				.0548146*
上月个人收入				.0163291*
F 值	26.5	39.47	145.13	142.33
自由度	2	5	9	12
R ²	0.0090	0.0326	0.1858	0.2687

(四) 小结

通过以上对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的回归模型我们可以看出,居住在城乡的人口的消费和闲暇模式的确存在显著差异,单独以户籍为变量时,有过农转非经历的居民与农村户籍人口和城市土著居民之间都存在显著差异,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引入了其他变量之后,随着引入变量的增多,他们之间的差异逐渐消失。同时,城市户籍居民与农村人口的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的差别也在控制了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之后逐渐消失,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我国城乡人口之间的消费模式和闲暇模式差异并不明显,城乡户籍居民之间的行为方式差别也并不是绝对不可逾越的,而是与经济水平、社会地位与个体特征强烈相关。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实际上是其他引入变量在起作用,无论是模型 3 中引入个体特征还是模型 4 引入的经济水平、社会地位,这些都影响着不同类型人口的消费行为与闲暇行为的产生,而始终存在的不同居住地之间的差异,可以看作是经济水平和社会地位的体现。

四、总结与讨论

1. 消费和闲暇方式的影响因素

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城市生活方式,而获得市民制度身份,即户口的原农民在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与农民和城市居民都存在有显著差异。但在引入其他可以代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量之后,这种显著差异消失了。这说明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才是影响城市生活方式的因素。因此,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不仅受制度身份的影响,也受其自身所处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影响。要完成农民市民化的转变,仅仅改变居住地和身份是不够的,需要提高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如果是收入和社会地位没有跟着户籍转变的话,不会带来实质的转变。而通过提高全体居民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可以在生活方式上完成其市民化。

2. 全民的市民化

研究也显示出,城乡户籍居民之间的差异随着其他变量的引入而消失,这说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模式和闲暇模式并未显示出显著的差异。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不仅农村人口经历着城市生活方式的变化,城市居民也经历着从传统的生活方式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的变迁。正如前文提到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包括地域面貌的变化,即农田和农家院变为城市的高

楼大厦,还包括农民主动或被动的变为城市人口,即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市民化。在这个意义上讲,市民化不单是农民和农转非居民的市民化,也是全体居民的市民化。这正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复杂之处,也是人口市民化进程的复杂之处,更是当下中国城市研究需要面对的复杂之处。

3. 研究的不足

同时我们也能看到本研究存在许多不足,首先受数据所限,未能区分不同时期的农转非居民。在中国社会所经历过的转型中,不同时期的农转非过程意味着需要完全不同的制度资源、经济资源等等,也意味着被转变的群体特征的不同。其次,缺少对农转非背后因素的分析,因为即便是在当下,不同的农转非过程也意味着不同的制度和经济依赖。第三,选择的因变量还可以被进一步扩展,消费方式和闲暇方式仅仅是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居民的社会参与、社会认同、社会网络都是考察市民化与市民融入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 陈传锋、杨晶晶 2007,《城市化进程中村转居》,《社区新居民的休闲方式》,浙江学刊第2期。
- 陈映芳 2003,《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陈彧 2011,《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第5期。
- 戴前宏 2009,《我国农民向市民转化的适应过程》,《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学报》第3期。
- 纪韶、李舒丹 2010,《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北京市为例》,《广东社会科学》第2期。
- 李辉、刘春艳 2007,《东北地区土地资源承载力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2期。
- 李路艳 2007,《农民市民化:理论解释与研究进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第3期。
- 李培志 2010,《城市生活方式的新动向:网络消费与网络休闲——基于文化堕距理论的考察》,《行政与法》第6期。
- 缪青 2009,《农民市民化要重视城市文明教育和公民教育》,《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3期。
- 刘传江、徐建玲 2008,《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 刘源、潘素昆 2007,《社会资本因素对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影响分析》,《经济经纬》第5期。
- 路小昆、孙英、刘文杰、李平、覃国良 2009,《徘徊在城市边缘: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
- 陆晓文 2006,《绝配致胜——城市不同群体的消费方式》,《特别观察》第10期。
- 毛丹 2009,《赋权、互动与认同:角色视角中的城郊农民市民化问题》,《社会学研究》第4期。
- 潘允康 2002,《拥有闲暇:城市居民新的社会财富观——家庭生活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江苏社会科学》第5期。
- 邱平 2010,《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市民”教育研究综述》,《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第12卷第1期。
- 谭春华 2008,《基于生活方式变化条件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研究》,《中国科技信息》第10期。
- 田珍 2009,《农民群体分化与农民工市民化》,《宁夏社会科学》第5期。
- 王春光 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及城乡融合关系》,《社会学研究》第3期。
- 文军 2004,《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吴业苗 2010,《居村农民市民化:何以可能?——基于城乡一体化进路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社会科学》第7期。
- 2011,《小农的终结与居村市民的建构——城乡一体化框架下农民的一般进路》,《社会科学》第7期。
- 谢建社 2006,《农民工分层:中国城市化思考》,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政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谢培熙、朱艳 2011,《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研究述评》,《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4期。
- 谢维卫、张立云 1999,《上海城市居民消费方式现状及研究》,《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卷第3期。
- 许成安、戴枫 2002,《城市化本质及路径选择》,《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
- 严翊君 2007,《长三角城市农民工消费方式的转型——对长三角江苏八城市农民工消费的调查研究》,《江苏社会科学》第3期。
- 张建国 2011,《转型期中国农民市民化研究回顾与反思》,《经济与社会发展》第3期。
- 张炜 2004,《城市化、市民化和城市文化》,《经济与社会发展》第2卷第1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易众